



论蔡元培

● 纪念蔡元培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

● 蔡元培研究会编

● 旅游教育出版社

论 蔡 元 培

纪念蔡元培诞辰120周年
学术讨论会文集

蔡元培研究会 编

旅游教育出版社

论蔡元培
蔡元培研究会

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一号)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排版
北京4225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毫米¹/₃₂开 15.5印张 390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5.60元
ISBN7—5637—0075—7/G·014

目 录

- 蔡元培先生——北京大学历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校长（代序）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研究会会长 丁石孙（1）
- 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20周年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胡绳（4）
- 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周谷城（9）
- 论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北京大学教授 梁柱（16）
- 蔡元培完全人格教育思想初探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高奇 程斯辉（38）
- 教育改革的先驱——蔡元培.....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张兰馨（55）
- 德育在蔡元培教育思想中的地位.....中华书局 陈铮（71）
- 教育领域的大改革家——论蔡元培教育思想和美育思想的
当代性.....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 杨坤绪（84）
- 试论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思想
.....哈尔滨大学文秘法律系副教授 张文泰（99）
- 近代中国提倡美育的先驱——蔡元培
.....[美]美国东部北京大学校友会会长 李辛之（115）
- 蔡元培的儿童教育思想.....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 陈志科（124）
- 蔡元培在嵊县期间的教育思想与社会思想
.....政协浙江嵊县委员会 钱方来（137）
- 蔡元培与天主教教会学校
.....[法]巴黎第七大学博士研究生 海博(Raibaud Martine)（148）
- 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北京大学教授 张寄谦（162）
- 蔡元培与东西文化融合
.....[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 戴维翰(W. T. Duiker)（178）
- 蔡元培对中西文化思想的“包”与“融”
.....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 王宁（189）
- 论蔡元培融合中西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崔运武（203）
- 蔡元培与社会主义思潮.....浙江省委党校 胡家玉（216）
- 蔡元培先生的政治思想评析.....北京大学教授 陈哲夫（232）
- 试论蔡元培先生的“和而不同”精神.....北京大学教授 萧超然（250）
- “学界泰斗”蔡元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胡国枢（259）

| | |
|---------------------------------------|-------|
| 从三次辞职看蔡元培先生的人格·····杭州图书馆馆长 陈 明 | (271) |
| 蔡元培与中国国民党(1926—1940年) | |
| ·····[美]新罕布什尔州立大学副教授 林敦(A. B. Linden) | (281) |
| 蔡元培与中庸之道·····国务院参事局 杨玉清 | (304) |
| 蔡元培与民权保障·····南开大学教授 高平叔 | (309) |
| 蔡元培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 张晓唯 | (330) |
| 蔡元培先生与科学方法·····贵阳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 刘宗棠 | (342) |
| 蔡元培与近代中国史学·····北京大学教授 陈玉龙 | (352) |
| 蔡元培先生与俗文学·····北京大学副教授 段宝林 | (359) |
| 蔡元培先生对妇女地位的看法·····民革浙江省委员会 朱馥生 | (375) |
| 论蔡元培妇女解放思想·····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 康沛竹 姬虹 | (387) |
| 蔡元培与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耿云志 | (396) |
| 蔡元培与陈独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周天度 | (417) |
| 蔡元培与黄宗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员 李安庆 孙必有 | (439) |
| 从蔡元培、张元济往来书札中看蔡先生二三事 | |
|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牟小东 | (451) |
| 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 | |
| ·····[民主德国]柏林大学教授 费 路(Roland Felber) | (460) |
| 蔡元培与法国·····[法]巴黎第七大学蔡萝莱(Tsai Loretta) | |
| 从清末中日关系论蔡元培思想的发展 | |
| ·····[香港]浸礼会学院 讲师 周佳荣 | (475) |
| 后记····· | (490) |

蔡元培先生 北京大学历史上 一位非常重要的校长

(代序)

丁石孙

蔡元培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的一位非常重要的校长，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两年前，我们成立了蔡元培研究会，并设于北京大学。北大研究蔡元培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通过对蔡元培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研究，对我们今天的工作有所帮助、有所启发。

今年是蔡先生120周年诞辰，同时也是北京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我们之所以把蔡元培学术讨论会的开幕放在北大校庆这一天举行，是因为蔡先生作为北京大学历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才使北京大学完成了历史性的转折，走上了自己新的光荣的发展道路。因此，这是具有双重意义的。

蔡元培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思想涉及的领域很广，很多方面我并没有研究。我作为北京大学现任的校长，我认为我们应当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学习些什么有益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所以我希望这次学术讨论会能对蔡先生的思想，特别是教育思想，多做些深入的研究。这对我们办好北京大学，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我自己认为，蔡元培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作为一个教育家，他应当了解社会的发展趋势，因为他的工作是教育后代的。如果他不了解社会发展趋势，也就不可能把握教育的方向。纵观蔡先生的一生，在很多历史转折关头，他都是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上的。他正确地把握住了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这是办好教育的重要前提。

其次，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所以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是因为他是真正理解年青一代，支持和扶植年青一代，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我的年龄比蔡先生晚得多，这一点我没有亲身的体会。但是例如上个月我又见到刘海粟先生，刘先生也已经九十多岁了，在事隔了那么多年之后，刘先生回忆起当年蔡先生是怎样培养、帮助他的往事时，依然非常动感情。他告诉我说，蔡先生对他一生的人生道路都有很大影响。最近我读到梁漱溟先生回忆蔡先生的文章，他也谈到当年他是怎样在蔡先生培养下到北京大学教书的，诸如此类，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第三，蔡先生把一个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京师大学堂，彻底改造成为一所推动历史前进的近代新型大学，从中可以看到蔡元培是真正懂得教育规律、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的，而不是简单地运用行政命令。

他真正懂得，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是建设好一支师资队伍，他用了很大力气来整顿这支队伍，争取许多著名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正是这一点，对于提高北京大学的学术水平和教育水平，提高北京大学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丰富的教育思想，有待我们去研究、发掘，以为借鉴。当然时代不同了，有许多口号、具体内容，应该作适当的修改，然而重要的，是其精神实质，因为教育作为一门科学，它是具有许多普遍性、持久性的问题的。

在北京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之际，我能有幸参与这样一个学术

讨论会，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没有读过蔡先生的许多著作，对蔡先生的思想，也只了解一鳞半爪。但通过自己多年的教育生涯和实践，也深深体会到蔡先生作为一位伟大教育家和思想家的深远影响。我希望这次学术讨论会成果丰硕、圆满成功！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研究会会长
丁石孙在蔡元培学术讨论会的开幕
词，根据录音整理、修改，本人同
意。）

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20周年

胡 绳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他生活在中华民族历尽灾难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为寻求中国的出路而进行非常艰难的探索，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蔡元培先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而且他有着自己的特色，独特的光彩。

年青的蔡先生是清朝的进士和翰林。清末转入反清民主革命。他是光复会的领导者，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组织的同盟会。他为民主革命做了许多宣传和组织工作，曾为清廷指名缉拿。这都说明，他一旦看清楚了清朝政府是没有希望的，不推翻清朝统治就不可能求得中国的独立、自由和进步，他就毅然抛弃功名利禄，投身于革命，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一辈子都保持着这种精神。

蔡先生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机构中虽然也做过很多重要工作，但是，当人们一想到蔡先生，大多数想到的是他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思想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但它与蔡元培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也是同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分不开的。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朝晚期已经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民国时期它的名称虽已改变，但校内风气仍然很腐败。蔡元培先生对这个学校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他在学生中提倡认真求学的精神，引导学生创办各种从事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的团体。他聘用了一批

以《新青年》为中心的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学者来当教员。在他主持下，北京大学不仅规模迅速扩大，而且学风大变，呈现了生动活泼的空气。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在学校中居于主导地位。蔡元培先生的言论和他在北京大学创导的风气，对新文化运动的确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当时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和北洋军阀政府对他攻击并施加很大压力。

这里应当说一下蔡元培先生这时提出的“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原则，这是蔡先生自己提出的。他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请入北大校园的同时，聘用了一些虽然在政治和文化上取保守态度但确有学问的学者当教员。这样做，既使无地位的新文化运动取得合法讲坛，又是尊重知识，尊重一切有价值的学术成就。有的教员，如辜鸿铭先生，虽然挂了个小辫子但很有学问。我不是尊重你的辫子，而是尊重你的学问。有材料记载，连胡适对蔡先生的兼容并包都不太同意，倒是陈独秀对胡适解释说兼容并包是对的。当时，有些学生对蔡校长容纳主张“尊王尊孔”、“君主立宪”的教员表示不理解。蔡元培先生解释说，他希望同学们学习这些教员的学问，而不是要大家追随他们的政治主张。由此可见，他并不是无原则地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从学术思想应当自由发展的观点出发提出他的主张，这是同当时主张依靠反动政治势力来压制新思想、新文化的做法恰好对立的。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得到蔡元培先生的坚决支持。他在运动爆发以前就支持，后来又积极营救在斗争中被逮捕的学生。他虽然因此而一度被迫辞职离校，但在返校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仍然本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支持各种新的思潮。1920—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他在北大，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在李大钊领导下，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都得到校长蔡元培的同意和支持。蔡元培先生自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想表示向往，他提出过“劳工神圣”的口号。在中国第一次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活动

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工友，而这次纪念活动是得到蔡元培先生的支持的。北京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基地之一，是和蔡元培先生的开明态度有关的。192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权革命主张他表示赞同，他也对俄国的十月革命表示赞赏。这显然都是因为他从来都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的原故。由于他的这些表现为反动的北洋政府所不容，他终于在1923年被迫离开北京大学。虽然后来又任命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但他始终没有再来过。

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的前后期间，确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他为中国新式的大学教育树立了楷模。他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但在五四时期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到一个新的时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1925年的革命高潮兴起时，蔡元培先生于1923年出国此时仍在海外，对于国内反帝斗争，他积极支持。1926年他回国参加国共合作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当时国内的复杂局势，对于一个几年离开本国的人，不是很容易弄清楚的。当1927年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发动所谓“清党”的时候，蔡元培先生附和“清党”的主张，不必讳言。但是在葬送了国共合作进行的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使蔡元培先生迅速感到失望，从蔡元培的许多言行中都可以看出，他从1928年起向国民党政府辞去一切职务。由于他是国民党元老，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人们给了他许多显赫的头衔，但是他除了担任教育和学术方面的工作外——教育方面他想实行法国那样大学院制度，不设教育部，未搞成；学术方面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其他任何党政要职，始终拒绝。

蔡元培先生一贯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他是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因此他不能同意国民党当局的对外政策。他又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所以他特别反对国民党当局残杀异己，实行特务统治。他为营救被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做了很多的努力（如营救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演达，还有其他共产党人），由于国民党当局

的坚决反共，这些努力有的虽略有效但多半都无效。特别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看到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实行不抵抗主义，一方面加紧镇压主张抗日救国的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的情形，蔡元培先生更加明确地站到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立场。他经常居留上海不到南京，他和国民党左派的伟大战士宋庆龄站到了一起，和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站到了一起。1932年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杏佛）诸先生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先生也应邀参加。蔡元培先生参与主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并且坚决驳斥国民党当局把同盟视为“非法”的论调。杨杏佛先生在1933年6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上海，暗杀杨杏佛先生这是对宋、蔡二先生和其他参加同盟的民主主义者发出的警告，迫使同盟只得停止活动，但蔡元培先生没有改变他的立场。他继续在上海支持进步的革命的文化运动。这有很多事实，最明显的是他与鲁迅的关系，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时，当时要举行纪念与追悼并不是简单的事情，是很困难的。蔡元培先生不顾个人的安危，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亲自主持葬仪，发表演说、后来并支持出版鲁迅全集。

蔡元培先生对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赴国难是积极支持的。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寄寓香港期间，赞助宋庆龄先生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并欣然受任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的名誉主席。1940年3月，在抗日战争开始第三年，蔡先生因病逝世。

我们从晚年的蔡元培先生身上，看到一个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者的伟大形象。1927年的暂时曲折并没有玷污他的形象，倒是证明，以蔡元培先生的处境，要笃守自己从来的信念不是很容易的事。如果不是能突破丛生的荆棘，如果不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万难做到的。而蔡元培做到了。蔡元培先生晚年爱护和结识为数不少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者。他走的道路是和中国共产党人相通的。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许多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政治活动家、科学家、教育家、文艺家，在为民族命运和中国人民利益而斗争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中国共产党是应该引以为荣的。

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在1928年成立的蔡元培先生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先生在经费异常支绌和其他困难条件下，建立和扶植这个研究院，直到逝世。在他主持下，中央研究院先后成立十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网罗全国最优秀的专家学者，还培养了许多科学研究者。他还是本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领导科学研究，在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中就有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如陈翰笙。蔡元培很相信他们的工作。中央研究院对中国科学的发展起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蔡元培先生毕生重视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常常发表教育救国论和科学救国论。但他不因此脱离现实政治斗争。他从事民权保障同盟的斗争，同时也在惨淡经营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先生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战友、惨遭枪杀的杨杏佛先生，就是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位总干事，他是蔡元培先生的亲密合作者，非常信任的得力助手。蔡元培先生说，提倡科学是为“救中国于萎靡不振中”。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主张科学为抗战国防服务。

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的许多学者，在1949年后，成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的领导人和骨干。蔡元培先生把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看成振兴中华的重要事业，他关于这方面的许多言论，现在看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蔡元培先生所建立的中央研究院已迁往台湾。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在前几任院长和现任的院长吴大猷先生主持下，也在科学研究的各方面取得优异的成绩。我认为，海峡两岸的科学研究机构都应当继承蔡元培先生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大陆的科学家期待着和台湾的科学家加强联系交流，用各种方式进行合作，以利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and 祖国统一的大业。这是在纪念蔡元培先生时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意思。

(本文根据胡绳同志在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录音整理)

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

周谷城

今天开会，一方面是北京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另一方面今年又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20周年，还有一点，今天是五四运动爆发的这一天。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就是1919年5月4日，到现在，刚好69年。北京爆发的这个空前的运动，起因是反对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签订和约。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是顾维钧、王正廷、魏宸祖等。学生一反对，他们就没有签字，这是好外交官。为什么要反对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呢？是因为别人要把我们的权利抢去，我们要收回来。山东的青岛（包括胶州湾）、胶济铁路等权利过去被德国占据，这次我们打了胜仗，德国是战败国，这些权利我们要收回。但是我们的日本朋友，那个时候可不是好朋友，他说那些权利要归他们。德国从中国侵夺的东西，不准归还中国，要归给日本，这怎么说得过去呢？我们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把这些消息透露给留学生转到国内，全国学生就爆发了一个空前的大运动。北京就有三十多所大专院校，两千多学生在北京大学开会决定在5月4日那天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处罚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亲日派。开大会、游行示威，每个人拿一面小旗，我也拿了一面小旗子，我也摇旗呐喊，我也算是参加了五四运动。但是我不是与闻机密的人，不是核心人物。队伍走到东交民巷，那里是外事机构所在地，希望各国能维持公理，但是那里的驻华使节不买帐。于是有人提出要到赵家楼去，到曹汝霖的住宅找他们赵家楼一伙。到时大家把门打烂，要放火烧房子，究竟打成什么样子，我没有进去。当警察

吹哨子要捉人，我赶快溜走了，我是个怕死的人。后来一看，天安门城楼上学生站在那里要东西吃，饿得不得了，后来其他学生送东西去吃。这是5月4日那天的运动，这个运动得到很大的结果。第一巴黎和会没有签字，我们没有丧权辱国，那几个外交家至少在那个时候表现是爱国的。这是一大成就。第二，赵家楼一伙虽不知道受到什么处罚，但不那么神气了，下来了。这也是空前的成就。第三呢，学生造成那么大的运动，喊出“处罚媚外官僚”，要阻止中国外交官在国际和约上签字，而且成了功。学生虽有几十个人被抓，但学生有勇气。5月6日又大罢课，闹得更烈，这问题就严重了，已经抓去的学生不得出来，政府还要抓人。蔡先生这时做了空前未有的贡献，他一个人在那里活动把学生保释出来，究竟他用了什么办法，我们不得而知。学生出来后，他就离开学校到了上海。他离京前留有这样几句话：“民亦劳止，讫可小休”，人民劳苦够了，该可以稍稍休息了。“我欲小休矣”，我蔡某也劳苦够了，我也想稍稍休息了。“杀君马者道傍儿”，这句典故，来历莫知，我也不去考证。蔡先生离开北京后，运动越来越激烈。蔡先生是划时代的人物，一走，运动就会产生消极影响。现在挽蔡又成为一个问题。

北京大学非常自豪，有些骄傲，的确它也有本钱可以自豪。当时有人要用全国罢课来挽留蔡先生，这谈何容易，赞成罢课的也有，反对罢课的也有。但北大当时有句歌谣，叫做“罢不罢看北大。北大不罢，要罢不能罢；北大要罢，不罢也要罢”。当时北大有那个气魄，在那时是个了不起的大学，居于领袖地位，蔡先生鉴于北洋政府已到末日，虽然回校但却“抱了必退的决心”，终于在1923年为抗议政府无视法律，再度辞职，自此就再未回到北京。从上面可以看到蔡先生对五四运动是大力支持的。

讨论到蔡先生的学术思想，我所晓得的，他有一句“兼容并包”。“兼容并包”这一思想在今天还是很有启发作用的。当时已是民国时期，已经没有辫子了，但他还敢于把有辫子的人辜鸿

铭请来教书，兼容并包不是有气魄么？还有两位先生，两个堂，罗雪堂（按：雪堂为罗振玉）、王观堂（按：观堂为王国维），是研究甲骨文的，也是拥护满清的，王观堂也是有辫子的。都是特请来的。旧的旧到这种程度，新的又新到什么程度？他把讲共产主义的也容得下，像陈独秀他也容得下。中国是文化很高的国家，我们都是学老古文，而蔡先生请来个胡适之，他要在中国搞白话文。白话文，中国历来就有，先秦就有，历代就有，五四时期也有。但是真正推行白话文，政府公告也用白话文，那要归功于胡适之。我对胡没有好感。自我晓得胡适之那一天起，没有与他讲过一句话。如果讲过，就是打笔墨官司；他骂我，我骂他；但是他没有骂得我赢。不过白话文若没有他的提倡，我们不会有今天这个情况。譬如像我这样的人，让我用那个老古文，何年何月才写得清白。让我用老古文写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怎么好写。只有写白话文才把我解放出来。所以胡适之提倡白话文的功劳是不朽的。而在这样一个几千年使用古文的国家，来一个说要搞白话文的，只有有气派、有度量的才能容得下。蔡先生有各种各样的思想，科学思想、民主思想。学术上讲兼容并包蔡先生是名副其实，作学问度量就要宽大些，他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常讲：“尊贤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好的人要尊重，一般的人容得下。好的人要奖励，不能干的人要怜悯。

其次讲到他的学问，他研究的范围有哲学、伦理学、美学、宗教论等。顶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是伦理学思想，二是美学思想。

伦理学方面，我看过他的《中国伦理学史》、《伦理学原理》。美学方面他有《美育代宗教》等著作。

伦理学，蔡元培先生是开山祖，过去也有人讲过，但没有他讲得这样完备。他的《中国伦理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在还在印。《伦理学原理》这部书是毛主席浓圈密点的一部书，也是我密点浓圈的一部书。当时我是想解决人生问题看这类

书的。《伦理学原理》里有：“至善快乐论”，人达到至善境界，就是快乐的。又有“无上命法”按道德作事，是无条件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为什么要做好事，没有什么原因，就是要做好事，这叫无上命法。他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是来自前辈。但到他手里，是他独创。

德国有位年青的哲学家，叫 Paulsen，他作了一本书叫 System of Ethics。书中似乎分三个系统，第一套系统是历史发展与人生；第二套系统是伦理学原理；第三套系统是道德论。这本书就成为伦理学的典范。美国的年轻学者，到德国去就学这本书，回国后写书，也用这个系统。美国有个杜威（曾到中国讲学）与塔夫脱（不是美国总统那一位）两人合写了一本伦理学，完全是仿 Paulsen 的系统，一、历史；二、伦理学；三、道德论。蔡先生的书，与德国、美国的体系大体相似。但他把中国精神贯彻了，有中国特色，如至善快乐论（中国有止于至善）。因此他讲伦理学，是第一个人，开创者。后来师范学校开设伦理学课，也以他所讲为基础。

另外还有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美育与宗教是相联的，这是毫无问题的。如果把佛教也算作宗教，那么佛教送给我们的美不晓得有多少。建筑艺术之美，有来自印度的；音乐之美，有来自印度的；雕塑之美，有来自印度的；绘画之美，有来自印度的；诗歌音乐之美，有来自印度的。佛教与艺术有不解之缘。蔡先生看到既然美与宗教有这样密切的关系，为什么不可以把美育代宗教呢？因此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我是不同意这样主张的。但是蔡先生的主张影响之大、效力之大，远远超过其他人。总之，伦理学在中国，蔡先生是首创者中之重要人物。以美育代宗教，是他讲的；兼容并包，现在看来还是很有影响的。

蔡先生领导北京大学那个时期，最大一个特点就是鼓励自由辩论，这也是五四时期最大的特色。五四时期没有讲到现代化，没有提机器代替人工生产，科学没有温床。但是除此而外，五四时期